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EVENING GLOW" LIBRARY
中国文联晚霞文库

荣天珣 著

周扬 与他的师友

中国文联出版社

周扬与他的师友

荣天珣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扬与他的师友 / 荣天琦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059-7551-4

I. ①周… II. ①荣… III. ①周扬 (1908 ~ 1989)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6002 号

书 名	周扬与他的师友
作 者	荣天琦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媛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551-4
定 价	3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历史眼光 独特视角

杨志今

荣天珣同志的新著《周扬与他的师友》就要付梓出版了。他嘱我为之作序,我诚恳地告诉他,我是无此资格的,可他仍坚持。他是我的老领导,为了这份令人感动的信任,我只有接受下来。读完书稿,我才愈加感到,这实在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书中围绕周扬同志所述所论的,大都是现当代革命史、文艺史上的领袖和名家。每一位历史人物身后,都有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思想史和文艺史的复杂而深刻的背景。对这样一部书要作出确当的把握和评说,是很困难的。我只有结合自己对作者的了解,谈一点随感式的体会。

这是一部独具历史眼光的书。作者自觉秉持一种审慎客观的论述尺度,总是试图从对象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条件出发,深入细致地考察他们在具体历史事件中的态度和表现;客观审慎地辨析他们之间关系变化的深层动因及其后果,从而尽可能使其描述和判断符合或接近对象的历史真实。在《女神把他的心弦拨动》中,作者始终把郭沫若和周扬放在现当代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描摹了青年周扬对郭沫若偶像般的尊崇,也

写出了郭沫若在特殊情境里某些令人遗憾的作为。最后,作者以客观审慎的历史眼光,通过晚年周扬,对郭沫若在革命史和文艺史上的历史性贡献作出了比较公道的评价。在《关于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中,作者把这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置于当时国际国内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宏阔背景下,作了理性冷静的梳理、剖析和总结。既肯定了其卓越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其难以逾越的历史局限性。这实际上也是对左联时期党领导文艺的历史经验及教训的梳理和总结。在本书的许多篇章中,即使是对于周扬这样作者十分崇敬的老领导,他依然努力秉持着自己的历史眼光。既充分肯定其对革命文艺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等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没有回避其在特殊条件下对待同志、战友时所表现的某种偏激或失误。这在关于周扬与鲁迅、周扬与冯雪峰、周扬与胡风等关系的历史梳理中都有精彩的呈现。正是这种独具历史眼光的描述和评析,使得这本书能为我们更加真实地认识历史、认识历史人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这是一部视角独特的书。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同周扬同志相识,并先后在其身边工作。同时,他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不仅同周扬同志有近距离的接触,也与文艺界许多名人大家有亲身的交往。这就为他的叙述和评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可以不断地变换观察的方位,围绕周扬与他的师友们的交往,从其相互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发展变化中,揭示出其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在《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中,对周扬与冯雪峰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仔细的梳理,让我们透过一些偶然性的事件表象,窥见了那一代人思想、情感、性格、心理的内在轨迹。特别是作者通过两人风雨沧桑几十年后各自的回顾与剖析,让我们得以拨开历史的烟云,触摸到了他们深层的思想情感脉动。不同角度的互为印证,他们一生的恩恩怨怨,便不禁令人感慨唏

嘘。在《为何一生为友终结怨》中，则深入揭示了周扬与胡乔木的微妙关系，以及他们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从中不仅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在那些特殊年代中的际遇、状态、情绪等，也可以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让我们知道他们后来命运跌宕起伏、不同走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即他们与毛泽东关系的特殊性和微妙性。这一独特视角的切入，的确为我们走近周扬和胡乔木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尤其是对两人晚年分歧的描摹，对乔木性格、心理、学养、爱好等的描述，为我们认识晚年的乔木和周扬提供了一幅多么鲜活的图画啊！

这是一部亲切质朴的书。荣天琦同志虽然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政策修养，但他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他一贯待人宽厚、随和，即使生气时也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剑拔弩张。他的这种亲切质朴的品性和本书客观审慎的风格自然地融为了一体，这就是在评人论事时，从容平和，分寸得当，把握适度，尽可能从论述对象的实际出发，而不简单地以自己的主观好恶来褒贬前人。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在对待前人时，总是小心翼翼，怀着一种敬畏之心。他的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总是在严谨缜密的推理论证后，在多重论据的支撑下才得以提出。在那些描述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生活、战斗、友谊和爱情的篇章中，他常常是满怀着崇敬之情，分析指出他们身上闪耀着的高贵品格的光彩，同时也指出其不可避免的性格弱点。正是这种对他们性格复杂性的剖析，才让我们更加感受到那一代人的可敬和可爱。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史中让我们感到可敬的形象比较多，而可爱可亲的形象似乎少了些。

这部书篇幅不长，部头不大，但是一部浸透了作者心血的书，是一部在长期辛勤积累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书。以我对作者的了解，以他长期以来收集资料的规模和数量来看，他完全可以写成一部洋洋洒洒的鸿篇

周扬与他的师友

巨制。可我拿到书稿后,放在手中反复掂量,对作者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他这种不慕虚荣、注重质地,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总之,只要沉下心来读完这本书,相信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读者,都会获得不同的教益和启迪。

2009年6月12日

目 录

序

历史眼光 独特视角 杨志今(1)

女神把他的心弦拨动

——周扬与郭沫若 (1)

锦鸡互赠美丽的羽毛

——周扬与冯雪峰 (21)

历经风雨四人情

——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在左联 (38)

人生难得一知己

——周扬与周立波 (59)

到最需要普及文化的去

——周扬与群众文化 (79)

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毛泽东与周扬 (91)

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

——周扬重返中宣部 (115)

求真之路漫漫兮

——周扬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程 (127)

周扬与他的师友

文化艺术建设的同志与战友

——周扬与周巍峙 (147)

为何一生为友终结怨

——周扬与胡乔木 (164)

虽不同生亦当共别人间

——周扬与苏灵扬 (185)

周扬的一个心愿 (193)

附录:

放到当时历史环境中去考察 (202)

关于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 (209)

后 记 (221)

女神把他的心弦拨动

——周扬与郭沫若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

把他们的心弦拨动，

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

——《女神》序诗

1925 年左右，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的周扬，读到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像当时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女神”以火山爆发般的热情，把他的心弦拨动，把他的智光点燃。他一遍一遍地朗读那些光芒闪烁的诗句，一次一次地思索诗中饱含哲理的寓意。啊！他豁然开朗，“凤凰涅槃”说的涅槃，不是寂灭，是凤凰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是诗人自己的新生，也是象征着苦难中国的新生。这是多好的诗啊！周扬从此成了郭沫若诗歌狂热的忠实的读者，他不仅自己这样爱好，也把自己的感受传之于新结识的好友周立波，立波也立即喜欢上了郭沫若的诗与散文。上世纪三十年代，立波在上海执笔为文时，便称赞郭沫若是新诗第一人，说“现在许多诗人的诗，我大多读过，在他们身上，我所

能够学到的，很少超过了旧诗人李太白和创造社诗人郭沫若”。

郭沫若浪漫的情怀，对光明的歌唱，就这样迷住了周扬。周扬喜欢上了郭沫若的诗，也喜欢上了郭沫若参与主编的《创造》等刊物，贪婪读着他能找到的郭沫若的著译，当他从《创造》上读到连载的郭译德国尼采的著作《查拉图司屈那》（即今译《扎拉图斯拉如是说》），又好像发现了一块思想的新大陆，尼采的一些名言：“上帝死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要反抗和否定一些旧的传统和权威”，同样使年轻的周扬心灵受到震撼和激动，这不就是五四运动倡导的思想解放的精神嘛！

青年人常常展开幻想的翅膀，去寻找自己崇尚的偶像，希冀像他们那样生活，那样战斗，那样追求理想。青年时代的周扬，崇尚的偶像是谁呢？其中之一就是郭沫若，以理性见长和性格矜持的周扬长久都把这个想法埋藏在自己的心底深处，直到几十年以后，郭老患病在床，周扬才把自己这种事隔半个世纪的崇敬之情当面向郭老表露：是郭沫若引他进入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殿堂，是郭沫若带领他到达人生理想的启蒙驿站。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末期，上海风起云涌的革命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教育和启发了周扬，他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不仅读了许多革命的书，而且直接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参加示威游行，半夜上街去散发传单、贴标语。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血腥的反革命政变，镇压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和进步的学生运动，白色恐怖弥漫了上海滩，革命者的血在不断地流。在共产党人的激励和鼓舞下，周扬没有被血腥的屠杀吓倒，而是更加义愤填膺地坚定了革命的志向，要为牺牲者复仇。经过同乡又是同学夏钟润的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哪知他在家过完暑假再返校时，学校党组织已遭到破坏，与他联系的党员不见

踪影，周扬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好借口休学回到益阳的老家，与结识不久的好友周立波聚在一起，共商今后的大计。向往革命的赤诚，把两位青年心连心凝结起来，他们发誓绝不退却，多么艰苦，也要披荆斩棘开拓出路来，去寻找党，去寻找革命。立波提出，去找他的一位亲戚——曾三，但赶到他家时，人去楼空，曾三已去江西，周扬很自然地想到寻找他崇敬的郭沫若，寻找拨动他心弦的人，但不知他在哪里。风闻郭沫若已去广州，两人便翻开报纸，寻找是否载有郭的行踪的消息。

寻找党，寻找拨动他心弦的人

郭沫若在哪里呢？1926年，郭沫若已在广州投笔从戎，走上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征途。用阳翰笙当时欢送他北伐的演说词来说，郭沫若这位“戎马书生”，现在武装北伐了，一支笔能够横扫千军万马了。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因郭当时还不是共产党，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戎马书生的名声，让他当了北伐军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到10月，北伐军总政治部随军迁往武昌，郭沫若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1月，南昌攻克后，郭沫若兼任总政治部南昌办事处主任，可以和蒋介石直接打交道了，也使郭沫若接触到这位总司令伪装革命的真面目。蒋介石实际上积极投靠帝国主义，勾结江浙财阀、地痞、流氓，随时都准备叛变革命。1927年3月以来，郭沫若耳闻目睹蒋介石在九江等地亲自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镇压革命群众、杀害共产党人的惨剧。感情丰富的郭沫若，怀着满腔的怒火，第一个举起了反蒋的义旗，写出了义薄云天的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檄文如黄钟大吕，喊出了革命人民的先声，义正词严地揭露了江西发生的一桩桩惨案，都是蒋介石阴谋策划所为，痛斥“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

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要打倒军阀，先要打倒蒋介石！”檄文写于3月31日，不久发表在当时的《中央日报》副刊上。那时，一些革命者仍被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迷惑，以致郭沫若紧急敲响的警钟，仍未使他们警觉起来。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便发动了更大范围的反革命政变，在全国各地肆无忌惮地屠杀共产党人。图穷匕首见，蒋介石当然不放过敢于公开揭露他的丑恶嘴脸的郭沫若，发出通缉的密令，并出三万元的赏格。郭沫若赶快化装离开蒋的监视，经过上海、武汉等地，然后和李一氓、阳翰笙等又折返南昌，参加了打响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武装斗争第一枪的八一起义。1927年9月，在南征途中的会昌，经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与贺龙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起义军遭受挫折失败，经党组织同意，郭沫若于1928年2月流亡日本。

周扬在寻找党的历程中，读到郭沫若那篇传诵一时的讨蒋檄文，年轻的心灵引起强烈的共鸣，不由得从心底深处，发出由衷的赞叹：写得多好啊！这正是千千万万革命者要说的话，再也不能让蒋介石这个大叛徒、大卖国贼、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隐藏和混杂在革命军队里了。他对舍身仗义执言的郭沫若更加崇敬了。周扬失掉党组织的联系后，无限焦急、苦恼和苦闷，虽然梦里寻它千百度，仍未找着。但从郭沫若讨蒋的檄文中，感到革命的声音、党的声音，冲破阴霾、乌云，仍然无处不在，这坚定了他和立波两位青年人不顾一切要去寻找党、寻找革命的信心与勇气。同样，他们也日夜担心郭沫若的安危。报纸上矛盾、错综的信息纷至沓来，有的对他污蔑中伤；有的造谣他已死；到后来，蒋介石的通缉令，也公开刊登在报上，令周扬、立波二人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

寻人无望了。1928年初，他们决心回到上海去，虽然那里还是阴

云密布，但革命中心总是革命者汇聚之地。周扬返回上海后，听说他的入党介绍人夏钟润已东渡日本，旋即追踪他赶赴东瀛。上世纪八十年代，周扬和我们谈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时，我曾经问过他，到了东京，你有没有想过去寻找当时亡命在日本的郭沫若？周扬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想过，特别是在知道夏钟润也失掉了和党的联系的时候，可惜，当时做不到。一是我在东京仅是短暂的停留，一年时间也不到；郭沫若在日本哪里，我也毫无所知。加上1929年，日本的政治气候朔风凛冽，日本政府严厉镇压左翼运动，便衣警察到处横行霸道，我就是去拜访一位日本左翼友人的时候，被警察逮捕的，幸亏我说找他是去探讨一个学术问题，经过搜查也无任何所谓的“罪证”，才得以释放，只好随即回国。

潜心隐藏 保存实力

周扬寻找的郭沫若，这时在哪里呢？大革命遭受挫折后，郭沫若在上海听从了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亡命日本，潜心隐藏下来，保存实力，可能的话，还可以写文章、出刊物、著书立说，扩大影响。1928年初，他和妻子安娜一起，几经周折，才在日本千叶县江户川畔定居安家来。日本警察当然不让这位鼎鼎大名的中国左翼人士，作为不速之客就此在日本潜藏起来，三番五次前来调查打听他的举止与活动，甚至加以拘留审讯，多亏日本友人相助，才使他得以免除牢狱之灾，这真令郭沫若感慨万端，“生身之国驱逐了我，寄身之国又随时可以囚禁我”。处此严酷的环境，郭沫若只好钻进书斋研究起中国古代社会的变革，以及金文、甲骨文等古文字学。直到他的第一部历史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及他在殷墟文字的研究上作出了使日本友人都为之

叹服的出色成绩，郭沫若才以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面目在日本出现，才逐渐摆脱了日本警察的纠缠。这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左翼文化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以鲁迅为旗手，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了名震一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随后又相继成立其它许多左翼文化团体，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形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新军，他们在文坛纵横驰骋，为革命的新文化披荆斩棘，开创道路。这时的郭沫若虽然远在日本江戸川畔，日本的警察对他的盯梢也没有放松，但他收到太阳社钱杏邨（阿英）的来信，征求他对创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他立即欣然同意，回信表示支持。他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鲁迅、沈雁冰、冯雪峰、沈端先、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寿昌、李初梨等五十余人联名发起组织左联。他无法返沪参加成立大会，为了表示作为一个盟员为昔日四分五裂的左翼文坛开创联合新局面的欣喜之情，他将自己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版税，献给左联，作为其活动的基金。不久，在东京活动的以群、任钧、谢冰莹等成立了左联的东京分盟（简称“东盟”）。潜居东瀛的戎马书生郭沫若又以左翼作家面目为国人所知晓了。

周扬为了找党，寻寻觅觅，从家乡湖南，经上海，到日本，又返回上海，走了一段艰难而又辛酸的路程。他和立波二人经常为此碰壁，立波有时苦恼得掉下伤心的泪来。坚定的革命理念支撑着他，向前、再向前。功夫不负苦心人，周扬终于找到了党。1932年，周扬从剧协参加了左联，遇到了冯雪峰。雪峰很赏识他的理论与组织才能，不久就让他编辑《文学月报》，并与夏衍一起帮助他重新入了党。1933年5月，丁玲被捕，周扬继任左联的党团书记。他仍然忘不了继续寻找他崇敬的郭沫若。当他从阿英处了解到郭就潜居在东京川叶县，就想方设法和郭沫

若取得联系。1933年9月，左联成员林焕平赴日本前，周扬找他谈了话，要他到日本后，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停止活动的左联东京分盟（东盟）恢复起来，团结在日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特别是流亡在日的郭沫若，要运用他的影响，开展左翼文化活动，并决定以后东盟的事宜，由周扬自己直接联系。

来自东瀛“喇叭”的支持

据当年在东京积极参加东盟活动的任白戈、魏猛克等人的回忆，东盟由于就近得到郭沫若的支持与帮助，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不仅在东京培养和教育了一批爱好文学的进步青年，还通过主办的几个刊物，将影响扩大到国内。开始的时候，郭沫若仍处于日本警察的监视之下，很少外出参加活动，只能由魏猛克等人与他往来联系，为东盟主办的刊物写稿。等到环境稍为许可，能够避开日本警察监管的时候，郭沫若还是不时参加东盟举办的活动，鼓励东盟同人，排除困难、开展工作。

东盟当时主办了三个刊物：《东流》、《杂文》、《诗歌》，郭沫若都有作品在上面发表。在《杂文》月刊上，经常看得到郭沫若的著译，如特约撰稿人一样。《杂文》虽在东京编排印刷，但寄回上海，在国内发行。不过到第三期就遭到上海反动当局明令禁止。还是郭沫若出了主意，借用歌德一本叫《质与文》的书的寓意，改名《质文》，又继续办了下去。质文社为了宣传革命文学理论，还出版了文学理论丛书，由郭沫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中摘译了一部分，取名《艺术作品之真实性》，作为丛书的第一种出版。当时，进步青年崇拜的两位文学大师——鲁迅与郭沫若，由于他们有过笔墨的纠纷，国内很难见到他们在同一刊物上著文发表。但经过东盟同人多方努力，两人的文章相

继在《杂文》上发表。鲁迅看到了这种现象也很欣慰，写信给魏猛克，希望左翼文艺界大力加强团结，并表示要与郭先生团结对敌。魏猛克把这封信给郭沫若看了，他很受感动，对与鲁迅团结一致对敌，也表示了极大的热情。1936年10月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东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追悼鲁迅，郭沫若在会上致了悼词，并在《质文》上发表了悼念鲁迅的文章：《民族的杰作》，对鲁迅作了最高的礼赞，称“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出一个新纪元”，“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郭沫若把他就近参加东盟的活动、讲演、写稿，作为流亡在海外的一个赤子，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与党的唯一联系，为党尽一点绵薄之力。郭沫若积极参加“国防文学”口号的讨论，就是想为党做一点事的表现。1936年，任白戈、林林等接到周扬的来信，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根据党的政策精神提出来的，示意东盟的同人支持。他们便去找了郭沫若，并带去党的《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上的报告，郭看后，甚为欣喜，认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很及时，他从心底里表示拥护，他对林林说：“好，党决定了，我就照办，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1936年6月间，他连续写了《在国防的旗帜下》和《国防、污池、炼狱》两篇论文。当时，在日本的他，以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是胡风提出来的，不知道这是雪峰和鲁迅商议后提出来的，因此参与了两个口号的论战。对国防文学的涵义，他在文中作了补充的解释，即“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鲁迅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中，对他的这点补充，表示同意，并加以引申，指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郭沫若看了这